

论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

谭 融 游腾飞

摘 要: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国进入转型期,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暴露出许多问题,如“美国式的认知失调”、政治实践与原则二者间出现裂痕、社会道德与政治日益腐化、社会问题频发和经济发展无序等等。由此引发了一场影响深刻的进步主义运动,使美国的政治理念发生转变,提出了新个人主义、政治与行政两分和新国家主义的思想观点,进而推动了美国的政治与行政改革。

关键词: 进步主义运动 转型期 政治理念

中图分类号: K7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11)01-0158-06

作者简介: 谭 融,女,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国政治和比较政治。

游腾飞,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政治制度。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国进入转型期,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暴露出许多问题,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影响深刻的进步主义运动。本文对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加以探讨,揭示这场运动的社会与思想根源,以求对美国社会转型期的内在变化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一、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

(一)工业文明的来临

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始于 18世纪末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至 19世纪末,美国在资本、技术、人口和市场等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本,为新工业部门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美国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为工业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保障,铁路网的形成及通讯技术的发展为美国开辟了广阔的市场,外来移民的涌入进而使美国在人力资源方面得到保障。在诸种因素的作用下,各州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全国性市场迅速形成,并进而推动了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第一次超过了农业产值,1900年工业制品价值超过农产品价值 2 倍多,新的工业部门和大型的工业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1860年,美国工业产值仅占世界第 4 位,到 1894年则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工业产量相当于欧洲各国工业生产总量的一半。从 1865年至 190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增长了 500%，“工业产值从 33% 上升到 53%，农业的绝对产值有所增长,但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却由 53% 下降到 33%”^[1]。

20世纪初,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工业从北部扩展至南部和西部,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迅猛

发展,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工业城市涌现,基本上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使美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二)社会转型期的困境

工业化的完成,使美国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西方世界,同时也给美国自身带来了许多复杂的问题。新的经济模式不仅引起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变,还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使美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表现为:

1. 垄断公司的形成威胁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1899年,美国有垄断公司185个,拥有资本总额30亿美元,占全国制造业资本的三分之一。^[2]垄断公司对市场的操控导致无数中小企业破产,市场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而出现混乱。垄断公司凭借其拥有的巨大财富,“强有力地影响着各个主要政党的活动,使得这些政党成为它们利益的代言人,并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政策过程。”^[3]

2. 社会分配不公,贫困化问题突出。1900年,美国的国民收入达到170亿美元,个人平均收入为327美元,处于世界最高水平。^[4]与之同时,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据查理斯·B·斯布尔1896年的统计,1%的美国人占有近一半的国家财富;12%的美国人拥有近90%的国家财富。^[5]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890年,仅纽约市就有50万居民住在贫民窟。^[6]1900年情况更加严重:1%的富人拥有美国财富的87%,而占美国人口八分之一的1000万人却生活在极度贫困中。^[7]

根据美国学者罗伯特·亨特的推算,1904年,美国工业地区家庭年收入不足460美元的贫困者约1000万,占全国人口的12%左右。^[8]新移民的大量涌入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困。1890年至1917年间,美国共有近1800万移民进入,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贫困国家。^[9]这些移民到美国后很难找到理想工作,只能聚居于城市贫民窟中,境况悲惨。社会贫困进而引发社会骚动和冲突。19世纪末美国工人运动进入高潮,1886年发生“五一”运动,1892年发生霍姆斯工人大罢工,1894年发生普尔曼工人大罢工,1902年发生矿工大罢工,等等。

3. 农业地位下降,农民陷入困境。工业化推动了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却使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加上工业资本家暗中操纵运输和仓储市场,使农产品运输和储存成本激增。庞大的金融资本企业盘剥农民,所提供的信贷成本常常使农民陷入困境。许多农民负债累累,不得不把农场抵押出去。农民处境的窘迫,直接导致了格兰其运动和绿背纸币运动的发生。

4. 政治腐败滋生,民主制受到挑战。随着垄断公司势力迅速膨胀和美国政府监管权力的软弱,企业开始与政府紧密合作。垄断公司经常买通政府官员进行腐败交易,官商勾结和权力寻租现象迅速蔓延。美国从乡镇到联邦都出现了政党机器,党魁控制着各级立法、行政和选举。马克·吐温在《镀金时代》一书中讽刺美国现实政治是自私自利的政治家进行腐败和欺诈的场所。^[10]1905年,美国《文摘杂志》刊载了法国人绘制的美国政治地图,对美国45个州的政治腐败状况加以区分:其中只有6个“没有腐败,政治清明”,25个“完全腐败”,13个“特别腐败”。^[11]“在一些腐败特别严重的州,如密苏里州和新泽西州,州立法机构和政府的关键职位都被铁路集团控制。西部各州政府更甚,几乎整个加州都成为南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囊中之物。”^[12]少数人控制着美国政治,使美国的民主制度成了徒有其表的空壳,“国家在没有财产权的公民关系中,变得日益强硬,而在对待资本家时,却显得越来越软弱”^[13]。

5. 城市管理混乱无序。美国工业的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据统计,“1900年,美国全国人口有7600万,其中城市人口已占32.9%(1790年时仅占3.3%,1860年时占16.1%)。全国2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10个,其中纽约市已成为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城市,人口约300万。”^[14]城市吸引了大量农村人口和来自非英语国家的贫民,然而他们素质低下,无一技之长,难以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很多人成为待业者,给城市带来贫困和犯罪。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尚不能满足城市化发展的需要,交通、卫生和住房等问题层出不穷。联邦政府对城市管理没有统一政策,市政机构不健全,权限不清,经验不足,使市政管理一片混乱。

6. 自然资源无序开发,生态环境遭受威胁。垄断公司唯利是图,对森林和矿产资源进行了掠夺性开发,“使美国森林面积由内战前的8亿英亩锐减到1901年的不足2亿英亩,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15]。1889年,内政部长卡尔·舒尔兹警告说:“现在头发已经斑白的人都能看到,从缅甸到加利福尼亚,从墨西哥湾到普吉特海峡,美国将不再有值得一提的森林。”^[16]

工业化给社会带来丰厚的物质财富,却没有消除社会贫困,反而给处于转型期的美国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出现“物质丰富与社会进步间的‘二律背反’,引起民众的不满和社会骚动”^[17]。人们感到困惑,改革者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三)政治危机的出现

进入20世纪,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逐渐取代农业社会,随之美国政治也开始出现危机。具体表现为:

1. 政府权力衰弱。在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视政府的存在为对自由的压制,认为政府是“必要的邪恶”^[18],主张通过限制政府的作用和规模去维护个人自由。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开始,各殖民地居民就具有明显的反权威、限制政府权力和自治的传统,导致政府权力分散和衰弱。然而随着工业化大潮的来临,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权力弱小的政府难以处理社会出现的复杂问题,美国的政治结构显现出它的僵化,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2. 政党分赃制出现。19世纪以来,为了适应大众民主选举的需要,美国出现政党政治。城市中的民众领袖通过在社区中建立职业政治组织去争取选票,或者“购买”选票。“久而久之,这些组织对选举的控制越来越牢固,美国的政治事务也就逐渐被它们操控在手中。”^[19]政府成为掌控政治权力的政党的“囊中之物”,而政党的权力则高度集中于政党高层的党魁手中。政党政治导致政党分赃,即在竞选中获胜的总统将政府职位分配给竞选中的支持者,引发政治腐化堕落现象频发、贪污受贿之风盛行,严重干扰了美国人的政治与经济生活。在政党分赃制下,官员任用不以能力为基础,任人唯亲。一些人称“政府供职者是具有如下三种品性之一者,即冒险家、无能者或无赖汉”^[20],导致政纪废弛、道德沦丧、行政效率低下。政府安置党徒亲信使联邦政府规模急剧膨胀,使政府官员更迭频繁,严重妨碍了政府管理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政党政治的天然缺陷为垄断资本家提供了操控政治的绝好机会,党魁希图通过提供政治恩惠换取选民的支持,而垄断企业则希图通过捐助政党及其候选人将其掌握的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二者一拍即合,使“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政治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21]。在联邦层次,总统上任后便完全依靠这些大财团;在各州,政党与大公司结盟操控州政治;在城市,经济利益集团和政党相互勾结的情景更是屡见不鲜。

总之,19世纪末,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导致大企业和金融寡头势力膨胀,垄断企业凭借其巨额财富与政府官员进行交易、相互利用,导致腐败成风、贿赂成灾。权力衰弱的美国政府无力应对强大私人势力的挑战,政府官员成为企业利益的代理人。社会的急剧转型引发了严重的价值危机和社会问题。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窘迫不堪。以致一些人断言,美国的政治系统在19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失败。“腐败的政治机器,立法过程中的行贿受贿,腐败的城市政治”,任何一项都成为美国“前进中的大礁石,除非特别熟练地航行,否则就会遭到灭顶之灾。”^[22]在这种情况下,不满现状的有识之士强烈呼吁政治经济改革以缓和社会矛盾,解决工业化带来的问题。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便在这一背景下发生。

二、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期的价值冲突

19世纪后期美国工业文明的来临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并未能使美国传统的价值和理想得以实现,相反,却使美国社会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源于美国人个人主义观念中隐含的内在矛盾以及其宗教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一)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潜在矛盾

个人主义是美国人所奉行的基本价值观,然而它同时包含着难以解决的潜在矛盾,它使“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陷入物质与精神的断裂、个人与社会的失谐之中”^[23]。个人主义价值观所隐藏的第一对矛盾是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个人与社会之间应为既相互分离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公共利益非个人利益的简单叠加,人们在社会中的共存须以牺牲部分个人自由为前提。一个稳定的社会需要找寻一个平衡点,一方面保护个人的基本权益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则能够保持社会的和谐。然而进入工业化时代的美国却难以获得此种平衡,日益庞大的垄断组织摆脱以往社会规范的约束,严重威胁到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社会日趋复杂,个人难以通过实现个体自由去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使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凸显。

个人主义价值观所隐藏的第二对矛盾是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美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历史传统、移民的文化心理背景,以自给自足、自由流动为特点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以团体为代表的社会组织结构,决定了个人主义具有鲜明的农业民主特点,即重自我独立、重个人尊严。”^[24]美国建国前,农业社会强调平等的个人主义观;美国建国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强调自由的个人主义观。此后两种观念在美国社会中并行不悖。然而19世纪后期工业时代的来临使这两者间的矛盾显现,自由与平等发生冲突。

工业时代的美国充满复杂的社会和道德问题,贫富悬殊、政治腐败触目惊心。西进运动结束后美国拓展空间受到限制,垄断资本的发展导致经济流动的僵化。严峻的现实使美国人感到在经济生活中失去机会,使个人尊严、幸福和自由平等的传统价值无法得以实现。

(二)基督教理想与社会现实的冲突

美国政治学家梅里亚姆说:“清教徒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在美国国民特征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25]清教徒信仰中的“天职观”对美国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此种观念意即:每个人必须勤勉于自己的工作,只有通过勤劳致富、在本职工作取得成功,才能获得上帝的恩宠。此种“天职观”隐藏着清教主义与残酷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为取得上帝选民的资格,清教徒辛勤工作,取得职业上的成功。然而,一方面,工业时代使人们对物质的渴望攀升,个人的成功导致物欲膨胀,物质世界的发展使精神世界日益缩小,乃至将清教徒推到理应遵守的道德标准之外。另一方面,垄断资本的形成使个人失去经济自由,使其发展受到限制,使个人通过努力得到救赎的愿望难以实现。人们的物质追求和精神世界发生严重对立,清教信徒出现严重的信仰危机。正如梅里亚姆所说:“在这新的和陌生的社会力量中,自由和平等应作何解释?在一个史无前例的环境中,政治和社会正义的概念应该是什么?”^[26]人们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

三、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政治理念的转变

19世纪末,美国政治思想领域所流行的自由放任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这一时期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腐败的保护伞。基于此,改革者开始反思美国的传统政治思想,提出了新的政治理念。

(一)新个人主义思想的出现

个人主义是美国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早期的移民为了摆脱他们在欧洲大陆遭受的政治和宗教压迫,在设计其政治体制和社会组织时,将保护个人权利置于首位。广袤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平等的社会条件为美国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有利因素。然而19世纪末,当美国步入工业社会时,传统的个人主义却面临挑战。个人主义的膨胀,使个体行为与社会共同利益之间出现矛盾,对公共利益造成严重伤害。“大公司的兴起,使少数人掌握了庞大经济力量和社会权力,直接对大多数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构成巨大威胁。”^[27]垄断导致机会不平等、社会流动僵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拜金主义和道德沦丧,使个人无法完全靠自我奋斗去实现人生价值。传统个人主义与社会现实产生矛盾,严重威胁了美国的社会、政治秩序及民主制度,使美国以个人主义为根基的政治思想发生变化。

进步主义运动时期,伴随着人们的反思,新个人主义思想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个人主义思想,代表人物为克罗利和西奥多·罗斯福。克罗利认为,在大工业和大金融时代,不干涉和放任自流的政策导致“财富权利和经济权利集中于少数缺乏责任感的人手中,这是我们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实行混乱无序的个人主义所造成的后果。这对国家的民主也是极不利的,这将导致政治弊端和社会不平等最终成为一种体制。”他指出,“美国生活希望的实现不仅需要最大限度的经济自由,而且还需要一定的制度约束;不仅要尽可能多地满足个人的需求,而且需要个人的服从,并具有忘我的无私精神。”^[28]克罗利描绘出一个个人与国家和谐一致的社会:“个人成为国家的缩影,为个人的独特目的而努力;国家成为一个放大的个人,它的目的就是关心人们生活的改善。在国家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29]克罗利的思想被称为“民主集体主义”^[30]。受到克罗利思想深刻影响的西奥多·罗斯福认为,“在一个单纯而贫穷的社会,民主制可以存在于纯粹的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但在一个富裕而复杂的工业社会则不能如此”^[31]。他反对漫无节制的个人主义,认为在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上,除竞争之外还须加上合作,方能保护个人权利。

新个人主义思想融合了集体主义思想,摒弃了极端捍卫个人自由的观点,体现为一种新的价值,以应对工业时代美国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新个人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现实

作用的产物,用以调整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视个人利益为社会利益的相互依存体,而非将个人自由和权利绝对化,主张以集体性行动弥补个人奋斗的不足,以合作互助缓和竞争。主张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加以干预,倡导企业与政府合作,崇尚个人与国家和谐共存。

(二)政治与行政两分观点的提出

19世纪末,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如缓解劳资纠纷、失业救济、环境保护、食品监管、国民教育、城市发展等等,需要政府予以解决。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增多,政府职能日益复杂。政府管理迫切需要理论指导,以满足社会对提高政府效率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1887年伍德罗·威尔逊发表了《行政学研究》一文,对政治和行政加以区分。伍德罗·威尔逊认为,政治与行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行政活动是政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行政活动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属于技术范畴,而政治活动则更为重大和复杂得多”,“行政应该处于政治领域之外,行政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尽管政治为行政确定了目标,但不应该去操纵行政活动”^[32]。通过探讨美国行政的发展方向,吸入自由民主的新鲜空气,排除官僚主义习气,并在汲取他国经验的基础上使之美国化。威尔逊关于政治与行政两分的思想以及1883年美国国会制定的《彭德尔顿法》所提出的文官中立原则,成为19世纪后期以来美国政治与行政制度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1900年,古德诺进而发表了《政治与行政》一书,继威尔逊之后对政治与行政的关系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古德诺认为,政治与行政的分立,是功能上的分立,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随着政府体制的发展,政府的这两种主要功能趋向于分化成一些次要的和从属的功能”^[33]。他认为,行政的各种功能与政治间的关系有所不同,其中,执行功能必须服从政治功能,其余很大一部分功能与政治并无联系,因此需要“组织一套完全不受政治影响的政府机构”。此类机构应具有两个特征:一是“不受政治影响”,二是“有相当长的任期”^[34]。此外,古德诺强调政治与行政两种权力的协调,主张建立确保政治与行政协调发展的法外调节系统。

威尔逊和古德诺关于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思想,成为进步主义时期美国政府行政制度改革的理论指导,为美国传统的三权分立原则注入了新的理念和实践性内涵,推动了美国的政府行政改革和权力扩张。

(三)有限政府观念的转变

进步主义运动时期,与新个人主义的兴起紧密相连的是美国人政府观的转变。如前所述,伴随美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出现规模庞大的企业。此类企业操纵着巨大财力,将自己凌驾于政府之上,使私人权力超越于公共权力,对国家和个人提出了挑战。人们开始关注政府对个人自由的保护,呼吁政府对社会和经济事务进行干预,使有限政府观发生转变。

此时期,美国政治学家克罗利提出了“新国家主义”思想,他在《美国生活的希望》一书中说:“改革是不可避免的,改革的目的是重建社会而不是恢复旧状态,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扩大政府职能,加强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主张抛弃杰斐逊主义,倡导“新国家主义”,以适应时代的变迁。^[35]受克罗利思想的影响,西奥多·罗斯福提出了“新国家主义”的竞选纲领。他认为,美国政府“近40年来都跟不上极为复杂的工业发展”^[36],必须将政府作为推行监管措施的有效机构,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控制垄断企业的过度发展,以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宪法中的共同福利”,保护个人自由与平等。^[37]政治学家李普曼也提出,自由并不是没有计划或不受政府控制,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代名词,认为“清静无为和软弱政府,那是对自由主义的曲解”^[38]。威尔逊则提出“新自由”理论。他认为,垄断托拉斯的出现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我们再也不可能回到个人竞争的旧秩序中去,所以建立在联合基础上的企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39]然而,垄断行为是“非法竞争”,使中小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大型企业合并成为唯一的财富和权力中心,它可能管辖其他各种各样的利益,因而会结束传统的美国民主制度。”^[40]因此,联邦政府必须对垄断组织加以控制,以保障民众的经济自由和政治权力。梅里亚姆说,“对政府管得凶的恐惧心理减退了,对自由竞争的无限信仰也减退了;取而代之的是认识到一定要有一个组织完善的政府,这个政府具有广泛的权力去控制不公平的竞争,提高社会效率和促进普遍福利。”^[41]

尽管这一时期一些人将新国家主义观视为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即具有践踏公民权利和剥夺自由的倾向,对之心存疑虑,但在总体上,美国的传统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变化,使政府和自由二者间关系得到某种调和,国家职能得以增强,政府日益强大,开始承担起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任。

综上所述,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美国在其社会转型期发生了一场进步主义运动, 它是对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出现的“美国式的认知失调”^[42]、政治实践与原则二者间的裂痕、社会道德与政治日益腐化、社会问题频发、经济发展无序和社会价值观扭曲的反映。这场运动使美国的政治理念发生转变, 提出了适应于时代脉搏的新的政治思想, 即新个人主义、政治与行政两分及新国家主义思想, 摒弃了极端捍卫个人自由的传统观念, 强调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干预的合理性; 一定程度缓解了美国的社会矛盾, 推动了美国的社会公平、公正和机会均等, 进而推动了美国政治与行政的改革和发展。

参考文献:

- [1]李庆余, 周桂银. 美国现代化道路[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49.
- [2][美]阿瑟·林肯·威廉·卡顿. 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册)[M]. 刘绪贻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38.
- [3][美]埃里克·方纳. 美国自由的故事[M]. 王希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75.
- [4][22]Gold, Lewis L. Reform and Regulation: American Politics from Roosevelt to Wilson.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1996. 24.
- [5][美]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 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M]. 南开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译.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 267.
- [6]黄绍湘. 美国通史简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426.
- [7]Flanagan, Maureen A. America Reformed: Progressives and Progressivism 1890s—1920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7.
- [8]Hunter, Robert. Poverty, Social Conscience in the Progressive Er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5. 237.
- [9]Shannon, David A.. 20th Century America: The Progressive Era.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4. 95.
- [10][美]马克·吐温. 镀金时代[M]. 李宜燮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556.
- [11]Mowry, George. The Era of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America, 1900—1920. New York: Harper Torch Books, 1958. 68.
- [12]资中筠. 20世纪的美利坚[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84.
- [13]Ekirch, Arthur A.. The Progressivism in America. New York: New View Points, 1974. 47.
- [14]侯文蕙. 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M]. 上海: 东方出版社, 1995. 55.
- [15]梅人. 美国四十任总统[M]. 北京: 时事出版社, 1988. 263.
- [16]Donald P. Sani. Forest and Conservation, 1865—1890. The Journals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2, Issue 2.
- [17][23][27]李剑鸣. 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M].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2. 24, 5, 229.
- [18][美]托马斯·潘恩. 潘恩选集[C]. 马清槐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3.
- [19][美]桑巴特. 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M]. 赖海榕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54—55.
- [20]Hoogenboom, Ari. Outlawing the Spoils: A History of the Civil Service Reform Movement, 1865—1883.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1. 108.
- [21][40][美]阿密泰·艾乔尼. 美国首府政治腐败内幕[M]. 陈银科等译.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110, 174—175.
- [24]张小青. 论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思想背景[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1987, (5).
- [25][26][41][美]梅里亚姆. 美国政治学史[M]. 朱曾汶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3, 5, 217.
- [28][29][35][美]赫伯特·D·克罗利. 美国生活的希望: 政府 in 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M]. 王军英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21, 354, 224.
- [30]Pells, Richard H.. Radical Visions and American Dreams.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Inc., 1973. 4.
- [31][36]Blum, John M.. The Republican Roosevel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110, 17.
- [32]Wilson, Woodrow.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2, No. 2, June, 1887. 210.
- [33][34][美]古德诺. 政治与行政[M]. 王元等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69, 47.
- [37]王希. 原则与妥协: 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修订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297.
- [38][美]亨利·斯蒂尔·康马杰. 美国精神[M]. 杨静予等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4. 327.
- [39]Wilson, Woodrow. The New Freedom. New York: Doubleday, 1913. 163.
- [42][美]塞缪尔·亨廷顿. 失衡的承诺[M]. 周端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5. 5.